

观澜文丛

学人书情

随录

◎马嘶 著



鲁迅情系琉璃厂

郑振铎抢救珍籍

郁达夫卖文买书

顾颉刚江浙收购杂书

陈寅恪世所千金为买书

朱胡子名震古旧书界

北大教授公开开办古旧书店

罗振玉力倡文澜阁藏书

.....



岳麓书社

17

观澜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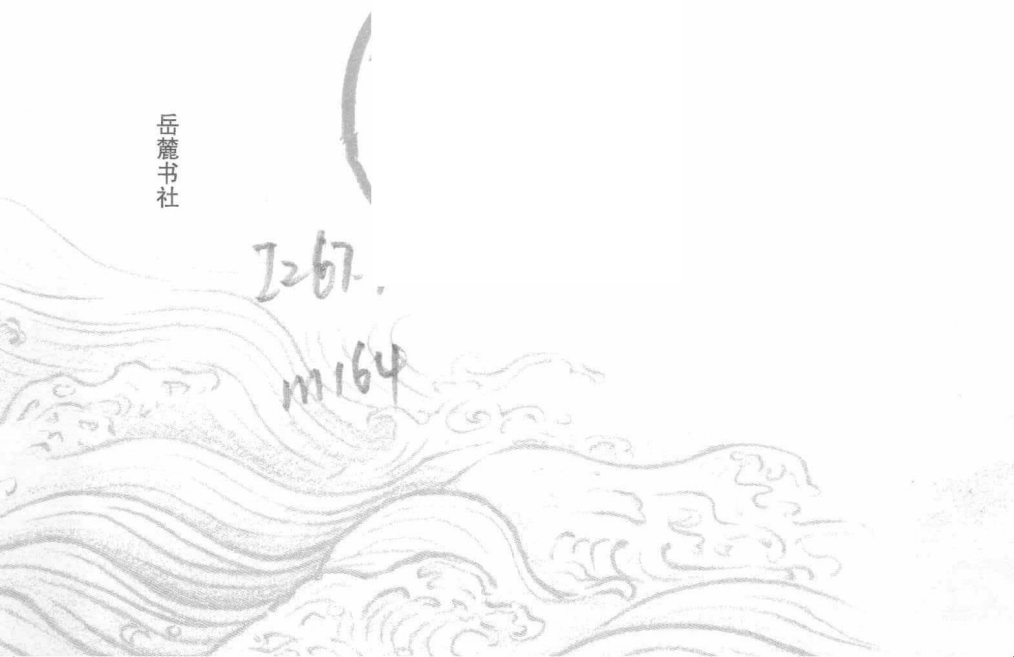
学人书情随录

◎ 马嘶 著

岳麓书社

J267.

m1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人书情随录/马嘶著. —长沙:岳麓书社,2009

ISBN 978-7-80761-337-4

I. 学… II. 马…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0686 号

· 观澜文丛 ·

学人书情随录

作 者:马 嘶

责任编辑:杨云辉

责任校对:舒 舍

封面设计:吴颖辉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 × 1240 1/32

印张:11.125

字数:210 千字

印数:1—5,000

ISBN 978-7-80761-337-4/I · 885

定价:25.00 元

承印: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目 录

自序 / 001

卷一 学人书情

009

鲁迅情系琉璃厂 / 010

郑振铎抢救珍籍 / 013

郁达夫卖文买书 / 015

顾颉刚江浙收购杂书 / 017

陈寅恪散尽千金为买书 / 019

朱胡子名震古旧书界 / 021

北大教授伦明开办古旧书店 / 024

罗振玉力护文渊阁残书 / 026

胡适的藏书 / 028

钱穆五年购书五万册 / 030

邓之诚购书博而返约 / 033

李大钊藏书归何处 / 035

朱自清与旧书店 / 038

柳诒徵舍命护旧书 / 0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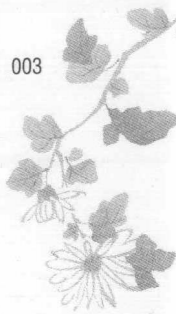
张中行的杂收与杂览 / 042

何其芳谈旧书的几封信 / 044

孙犁津门聚书 / 046



- 北大卯字号名人朱希祖 / 049
- 己卯年说“卯字号”名人 / 053
- 陈独秀绝笔书稿今何在 / 059
- 蔡元培的保定之行 / 066
- 周作人的两次保定之行 / 070
- 近看汤用彤 / 078
- 冯友兰沉潜得最久的两个书斋 / 089
- 燕南园66号 / 096
- 编辑家、出版家叶圣陶 / 100
- 刘半农之死 / 105
- 魏建功与台湾国语运动 / 116
- 魏建功手书《鲁迅先生诗存》 / 120
- 朱偁先生的爱国情怀 / 124
- 圆梦燕南园 / 130
- 燕东园之忆 / 134
- 我的几位业师 / 139
- 张中行的博、雅、朴 / 147
- 夕阳篱下语如丝——当今文坛一大景观 / 158
- 听川岛（章廷谦）讲鲁迅 / 162
- 忆浦江清师 / 170
- 旷世奇才金克木 / 177



书缘：一个长长的故事 / 190

孙犁作品中的书香 / 194

艾青：深刻的幽默 / 199

孙竹篱论画和作画 / 203

管桦的乡土情结 / 213

与韦君宜《思痛录》有关的一段回忆 / 217

学人交游多论学——读《积微居友朋书札》感言 / 220

“遗少”与使者 / 224

《北大风》引起的忆念 / 227

廖静文在北大的日子 / 231

追寻《红楼》诗 / 240

卷二

书厄谈往

243

我和《1937年中国知识界》——答《新世界》周刊记者欧阳海燕问 / 244

日寇侵华，中国文人的非正常死亡 / 247

寻觅精神家园的文化流民 / 256

学人文士毁失藏书的大劫难 / 265

与大屠杀同步的南京“文献扫荡” / 273

图书馆与出版业遭日寇摧折 / 279

振兴中华的文化机缘在战乱中丧失 / 287

卷三

书香漫笔

293

偷藏禁书 / 294

恋书情结与学人立业 / 296

书到用时方恨少 / 299

聚书与散书 / 302

书商与书香 / 306

文人的书斋 / 309

书斋雅名拾趣 / 311

洞察自然的明澈眼睛 / 314

读名人书札 / 317

我所珍视的文人日记 / 320

毛边本，我的钟爱 / 327

喜获毛边本旧书 / 329

开卷益得谈 / 331

雨天看闲书 / 334

“预谋”读书 / 336

著作等身与虚怀若谷 / 340

“《开卷》精神”与书香社会 / 343

《空间的驰想》线装本出版感言 / 347

自序

这些围绕着书人书事随意而谈的闲文短章，是我承受传统文化哺育和国学熏陶的人生轨迹中一些零星的记忆与情思。这种芜杂又欠完备的述说，表现的不过是对长期濡染了我的心态、铸造了我的灵魂的某些书和人的深切眷恋之情。或者说，这是我对心向往之的“书香”（或可拓展为“书香社会”）点滴的浅薄思索和粗笨解读，充其量不过是说出了自己的一点经历和心得而已。

这本随笔选集，写作的时间跨度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本世纪最初几年，这正是我从岗位上退下为自己制定的治学与著述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两个“五年”。这些或短或长的文字，是我在撰写几部专著的间隙写出的。除了几篇需要查阅、使用大量文献资料并需进行较深入思考的长文，这些小品短章多是匆促成篇，论述也多是浅尝辄止的（这也许是由报纸专栏文字急迫的时间要求和字数的严格限制使然）。虽然文字是近十余年间写出的，但一些文章所讲的内容和使用的资料，却已有长长的几十年历史了。

我生长在洋溢着淡淡文化氛围的家庭环境中，自幼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熏陶，较早地闻到了古老文化扑鼻的芳香，初步养成了崇尚高雅文化、追求清纯朴淡生活情趣的习惯。但这

不过是根柢并不深厚的普通耕读之家的人生成长环境。而真正接受系统的国学基础教育，较深度地吸纳博大精深的中国古老传统文化的精髓，从而走进修炼学人之身的门径，还是1950年代初、中期就读于北大中文系之后。

1953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这对我是至关重要的，是我一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关口和基础，由此定位了我的人生之旅。

这一年，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肇始之年，全国高等学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尚未完全结束，北大、清华、燕京三所名校合并为二，三校的文、理、法学院各系并入北大，工科并入清华。北大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清华成为多科性工业大学，燕京大学撤消，北大从沙滩红楼等地迁入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次年，以王力（了一）教授为系主任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师生并入北大中文系。此时，北大中文系已成为人文荟萃、大师云集、令海内外学界瞩目的人文学科的学术圣殿。这是北大中文系百年历史中最令人艳羡也最值得称道的时期之一。

在北大的四年中，我有幸受业于20世纪下半叶中国第一流的著名学者（有多位是堪称国学大师的），亲聆他们的谆谆教诲，他们的深厚学养和高尚的人格力量，给予莘莘学子的惠泽，足以让我们受用终生，由此打下了做学问和文学创作的扎实根基。

我的业师们多是出生于19世纪最后几年和20世纪最初几年，他们是“五四”新思潮的直接承受者，是世纪之交西学东

渐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汇互补的受益者，他们中有不少是在西方或东洋留过学或访过学的。他们，不仅有着深湛的国学修养，而且深谙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方法。这些学贯中西的世纪学人，那时多正处于四五十岁的壮盛之年，但他们早已是驰名海内外的大师级学者，乃至在治学上臻于炉火纯青之境的学界耆宿了。杨晦（系主任）、俞平伯、魏建功、王力、游国恩、余冠英、浦江清、吴组缃、林庚、周祖谟、高名凯、章廷谦（川岛）、袁家骅、岑麒祥、王瑶、季镇淮、朱德熙、林焘、孙楷第、梁启雄、蒋荫恩、罗列、甘惜分、阴法鲁、阎简弼、杨伯峻、郭良夫、冯钟芸、姚殿芳、彭兰、吴小如、乐黛云、梁东汉、吕德申、陈贻焮、唐作藩……

单是这一长串耳熟能详的名字，就足以使熟悉现当代学术史的人赞叹咂舌的。外系教授给我们讲课的，则有历史系的邓广铭、周一良，西语系的冯至、李赋宁，俄语系的曹靖华、李毓珍（余振），东语系的季羨林、金克木，文学研究所的何其芳、蔡仪、陈涌；外校著名学者刘大杰、钟敬文、夏承焘、



王季思等也来讲过课。还听过文艺界著名人士周扬、冯雪峰、冰心、丁玲、艾青、田间、臧克家、张光年、力扬、王亚平、李季、阮章兢、贺敬之、公木、沙鸥、徐迟、贾芝、牛汉、蓝曼、白桦等人的讲座和讲课。名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以及这些知识精英们智慧的点拨、熏染，使我们的知识结构日趋合理，学养渐进丰富，治学渐入门径，学术视野逐步宽阔。

在负笈燕园的日子里，我的志趣和努力方向一直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这两者之间徘徊着。当作家，这是我自中学时就选定了的志向，我始终在为实现这个梦想而努力着。来到北大，我写了不少诗和散文，在各地报刊上发表了一些作品，成为当时小有诗名的北大校园诗人。

然而，由于我受到了那么多堪称一代宗师的著名学者的学术熏陶，接触到了图书馆中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我又时时渴望着能够像我的业师们那样，成为一个有着深湛文化素养的学者。我为此而认真地在课堂上听讲，在图书馆里涉猎众多的参考典籍，大量摘抄各种文献资料。我做了许多必要的笨拙的为学术打基础的工作。

由于不断动摇于两种不同的志愿之间，就不可避免地浪费了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我所下的这些功夫，又理所当然地使我成了一个两栖类的学人。这正如说“开卷有益”或“开卷有得”一样，我所下的工夫总归是有所得的，不是虚掷的。如今，朋友们称我为“学者型的作家”，或者“作家型的学者”，这大概是说，作为作家，我的作品比某些作家多了一些

文化内涵和学术含量；作为学者，我的著述又少有板滞的学究气和学院派常有的拘谨。我想，这可能是由大学读书期间的那种志趣摇摆所造成的一个特点吧！这个特点，是优长耶？抑或缺陷耶？

当然，我也有自知之明：我所缺乏的，正是如我的一些终生教书做学问的学友们那种刻苦钻研、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也缺少如我的一些作家朋友们那样，能够深刻地剖析现实生活、有着纵横开阖的丰富想象与情感的起落激荡。我终究是个两栖的文化人。

不过，我历来倒是很为重视各种资料的收集、积累、收藏和使用的，这是做学问和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良好习惯。在受业于燕园时，我不仅注意吸收老师们的学术滋养，也注意观察、研究、学习他们的治学方法、处世做人乃至生活情趣。

在王力教授的书斋里，我惊奇地看到了卡片橱里那难以数计的墨色不同的资料卡片，知道了他在开讲这门首创的《汉语史》时，曾经下了多少笨重的苦功夫，从而体会到了做学问的艰辛。在游国恩和林庚教授的小客厅里，我感受到了学富五车的大学者，过的是怎样一种素朴、淡雅、清纯的全天候的学人生活。这里是一片圣洁的净土，闻不到一丝污秽的空气。在汤用彤副校长燕南园58号寓所的书斋里，我走进那如长长的小巷似的一排排书架间，眼前只觉书浪翻滚，犹如跳进由中外典籍铺陈而成的浩瀚大海。在这里，我感到了自己的无知、浅薄和渺小。在燕东园37号中文系主任杨晦先生的接待室里，没有一

点豪华的陈设，也没有沙发软椅，只有几件冷硬的木制家具，令人有家徒四壁的感觉。唯有迎面靠墙的一件高及屋顶的宽大木橱，里面装的全是书。在魏建功先生讲课时临时居住在燕园未名湖边的一间公寓里，我听到了他热情、坦率、毫无遮拦的谈话，在学生面前，这位德高望重的国学大师袒露的是一颗坦诚的赤子之心。

所有这些，都深深镌刻在我的记忆里。离开北大以后，我又始终不懈地追寻、关注着业师们的学行业绩，一点一滴地记录着他们的每一项成就。正是由于这样的细心观察、长期积累，我以后才写出了《燕园师友记》、《负笈燕园》、《学人往事》、《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一代宗师魏建功》、《林庚评传》和其他几部为著名学人立传的著作。

我是1957年那个特殊的年份从北大毕业的。那一年，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使众多的知识分子遭到屈辱，在那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许多青年学子的才华与个性发展自然也受到挫折，他们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创伤是严重而深远的，从此便无奈地向着“臭老九”的荒秽野径陷落。难怪学友们感慨地说：“难道我们是中国末代知识分子吗？”毕业分配的不理想也就是必然的了。

离开北大后，我转换过数种职业，做了四年中专教师后就调到文化战线，做过专业戏曲剧团编剧，文化局创作员和研究员，文学刊物主编，文艺单位业务与行政领导，等等。这些工

作大多与我心向往之的书斋生活只有咫尺之遥，因而我也一直坚持读书、治学与写作，仍然是在义无反顾地（哪怕是相当缓慢，有时甚至是停顿的）在为我青年时代立下的志向努力着，前行着。即使是在崇尚“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主流思想的“十年浩劫”时期，我也想方设法解决极度的精神饥渴，偷偷地或寻找种种理由名正言顺地读书。

“文革”初期，我在保定地区文化局戏研室工作，每天除了例行的“早请示，晚汇报”，上了班大家便坐在一起念“语录”，背诵“老三篇”。日复一日，没有改变。我忍受不住这单调乏味的所谓“认真读书”，便谋划出了一个拓展读书范围又使之合法化的方法。我买来了刚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又搬来了《辞海》、《词源》、《诗词格律》等工具书，边读诗边翻词典，查词义，做注解，研究格律，在书页的天头地脚写释义，加眉批，作艺术分析，把一本诗词集涂抹得墨迹斑驳，几无素洁之地。

就这样，我读毛主席诗词，又读词典，借机翻阅了大量有关和无关的文字，聊以消解眼前的知识焦渴。我的这种办法竟被许多同事所借鉴，成为一时之盛，而且从没有人怀疑我这个始作俑者是对那种生活的厌倦和不满。在两派武斗升级、杀伐之声不绝于耳的日子里，我躲在租住的市郊一间农家老屋里偷读那些所谓“封、资、修”的禁书，着实地过了一把“雪夜闭门读禁书”的雅瘾，大大地满足了我饕餮的文化知识胃口。

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时，我买来了英文版和俄

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带来英汉字典和俄华字典，对照着读，这样，我便可以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读外语了。后来，我把我的这种行为称之为“预谋读书”，本集子里的《偷藏禁书》、《预谋读书》等篇写的就是这些情况。当然，在那些年中，我也不不可避免地虚掷了很多宝贵的时间。

直到从岗位上退休以后，我才过上了纯而又纯的书斋生活。从此，我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全天候地为实现青年时代的梦想而努力着。

为了抢回半生中浪费掉的那些大好时光，我甚至比在职时更加珍惜时间。这个集子中的文字，都是在这个时间里写出的。而我用以治学、著述和收藏的大量图书文献，也多是这些年中积聚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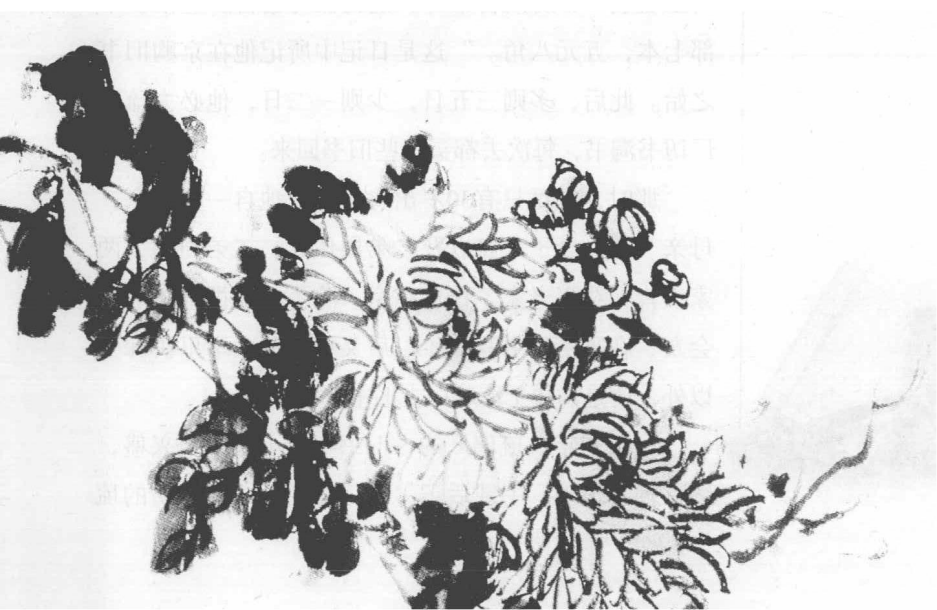
马嘶



己丑早春于紫骝斋

卷一

学人书情



鲁迅情系琉璃厂

鲁迅日记中所记之事简略至极，独有书事（买书、抄书、修补书、他人寄赠或寄赠他人之书等）所记甚详。凡购书地点（乃至书肆）、书名、册数、书款等项都详记于日记中。一年过去还要抄写一份全年的书账附于日记之后，有时还在书账之后写一后记。看了鲁迅的书账，他的淘书情状、读书与藏书概况、各个时期的搜求重点和购书情趣，都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看来，淘旧书，在这位伟大思想家、文豪的生活中是何等重要的事。

鲁迅于1912年5月初到北京，在中华民国教育部任职，他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这里离琉璃厂很近，琉璃厂便成了他经常造访、情之所系的地方。他来京后的第一个星期日（5月12日）的下午，便同友人去琉璃厂淘书。当天的日记中记着：

“至琉璃厂，历观古书肆，购傅氏《纂喜庐丛书》一部七本，五元八角。”这是日记中所记他在京购旧书之始。此后，多则三五日，少则一二日，他必去琉璃厂访书淘书，每次去都买一些旧书回来。

那时，鲁迅只有30岁出头年纪，独自一人在京，母亲、结发妻子朱安以及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两家人皆在绍兴老家。鲁迅在京，除了上班视事供职、会友、在寓所读书写作（以后又在几所大学里讲课）以外，便是徜徉于琉璃厂古旧书肆书摊。

民国初年，琉璃厂的古旧书业尚十分繁荣兴盛，缪荃孙《琉璃厂书肆后记》续记的便是清末民初的琉

